

梅新林 俞樟华 主编

中國學術編年

隋唐五代卷

陈国灿 撰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UND PROJECT

梅新林 俞樟华 主编

中國學術編年

隋唐五代卷

陈国灿 撰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VI HORAE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 策划

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重点项目
浙江省人文社科基地浙江师大江南文化研究中心重点项目

顾 问 (按姓氏笔画)

甘 阳 朱杰人 朱维铮 刘小枫 刘跃进 安平秋 李学勤 杨 忠
束景南 张涌泉 黄灵庚 常元敬 崔富章 章培恒 詹福瑞

主 编

梅新林 俞樟华

总策划

倪为国

编 委 (按姓氏笔画)

王德华 毛 策 叶志衡 包礼祥 宋清秀 邱江宁 陈玉兰 陈年福
陈国灿 林家骊 胡吉省 姚成荣 倪为国 曾礼军

前言

自1985年率先启动《清代学术编年》研究项目以来,经过诸位同仁持续不懈的努力,由清代依次上溯而贯通历代的《中国学术编年》(以下简称《编年》)终于告竣。这是迄今为止学术界首次以编年的形式对中国通代学术发展史的系统梳理,是一部力图站在21世纪新的学术制高点上全面综合与总结以往学术成果的集成性之作,同时也是一部兼具研究与检索双重功能的大型工具书。衷心希望《中国学术编年》的出版,能对21世纪国学的研究与复兴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从《清代学术编年》项目启动到《中国学术编年》告竣的20余年间,恰与世纪之交以“重写学术史”为主旨的“学术史热”相始终。因此,当我们有幸以编撰《中国学术编年》的方式,积极参与“重写学术史”这一世纪学术大厦的奠基与建设工程之际,在对《中国学术编年》的编纂进行艰苦探索的同时,始终伴随着对“重写学术史”的密切关注以及对如何“重写学术史”的学理思考,值此《中国学术编年》即将出版之际,我们愿意将期间的探索、思考成果撰为《前言》冠于书前,期与学界同仁共享。

一、世纪之交“学术史热”的勃兴与启示

一代有一代之学术,一代亦有一代之学术史,这是因为每个时代都有对学术理念、路向、范式的不同理解,都需要对特定时代的主要学术论题作出新的回答。从这个意义上说,“重写文学史”既是一种即时性学术思潮的反映,又是一项永无止境的学术创新活动。不同时代“重写文学史”的依次链接与推进,即是最终汇合成为学术通史的必要前提。

世纪之交,以“重写文学史”为主旨的“学术史热”再次兴起于中国学术界,这与上个世纪之交的“学术史热”同中有异:同者,都是集中于世纪之交对源远流长的中国学术史进行反思与总结。异者,一是旨在推进中国学术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一是旨在通过推进中国现代学术的世界化而建构新的学术体系,因而彼此并非世纪轮回,而应视为世纪跨越。

本次“学术史热”以北京、上海为两大中心,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发端于“重写文学史”,然后逐步推向“重写学术史”。诚然,重写历史,本是学术发展与创新的内在要求,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重写”成为一种学术时尚,普遍被学者所关注与谈论,几乎成为一个世纪性话题,却缘于特定的时代背景。诚如葛兆光先生所言,80年代以来有一些话题至今仍在不断被提起,其中一个就是“重写”,重写文学史,重写文化史,重写哲学史,当然也有重写思想史。重写是“相当诱人的事情,更是必然的事情”(《连续性:思路、章节及其他——思想史的

写法之四》,《读书》1998年第6期)。其中的“必然”,是从最初对一大批遭受不公正对待和评价的作家文人的“学术平反”,到对整个中国学术文化的意义重释与价值重估,实际上是伴随改革开放进程的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故有广泛“重写”之必要与可能。

从“重写文学史”到“重写学术史”之间,本有内在的逻辑关联。“重写文学史”作为“重写学术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开路先锋,向思想史、哲学史、文化史等各个层面的不断推进,必然会归结于“重写学术史”。在从“重写文学史”走向“重写学术史”的过程中,同样以北京大学为前沿阵地。早在80年代初,北京大学王瑶先生率先发起了有关文学史的讨论。至1985年,陈平原先生在北京万寿寺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创新座谈会上宣读了他与钱理群、黄子平先生酝酿已久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基本构想(后发表于《读书》1985年第10期),给重写文学史以重要启发。同年,著名学者唐弢与晓谕先生等就是否可以重写文学史问题开展激烈的争论,由此形成“重写文学史”讨论的第一次高潮。然后至90年代初,陈平原先生率先由“重写文学史”转向“重写学术史”的实践探索,从1991年开始启动《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的写作,主编《学人》杂志,筹划“学术史丛书”,到1995年“学术史丛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世纪之交“重写学术史”取得阶段性成果的重要标志。而在另一个学术中心上海,先于1988年在《上海文坛》专门开辟“重写文学史”专栏,邀请著名学者陈思和、王晓明先生主持,他们在开栏“宣言”中开宗明义地提出“重写文学史”的学术宗旨,并给予这样的历史定位:“我们现在提出‘重写文学史’,实际上正是在文学史研究的性质发生改变的时期,是现代文学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逐步走向成熟的时期。”王晓明先生还特意将“重写文学史”溯源于1985年万寿寺座谈会上陈平原等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构想”,“重写文学史”不过是将三年前“郑重拉开的序幕”再一次拉开,这是旨在强调从1985年到1988年“重写文学史”讨论两次高潮的延续性以及京沪两大学术中心的连动性。1996年,在章培恒、陈思和先生的主持下,《复旦学报》也继《上海文坛》之后开辟了“重写文学史”专栏,由此促成了贯通中国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交叉学科的创立。然后至1997年、1998年连续于上海召开“20世纪的中国学术”、“重写学术史”两次专题学术研讨会,尤其是后一次会议,在全国学术界第一次明确打出“重写学术史”旗号,具有时代标志性意义。此后,以京沪为两大中心,广泛影响全国的“学术史热”迅速升温。除了各种学术会议之外,各地重要刊物也都相继开辟学术史研究专栏,或邀请著名学者举行座谈。当然,最重要的学术成果还是主要体现在学术史著作方面,从分科到综合,从断代到通代,从历时到共时,从个体到群体,以及各种专题性的学术史研究领域,都有广泛涉及,这是来自不同专业领域学者在“重写学术史”旗帜下的新的聚集、新的合作、新的交融,共同创造了世纪之交学术史研究的兴盛局面。期间的代表性学术成果,主要体现在理论反思与实践探索两个层面。

在理论反思方面,集中体现于各种学术会议与专栏讨论文章,比如1997年在上海召开的“20世纪的中国学术”讨论会上,与会学者就“20世纪中国学术”的历史起点与逻辑起点、学术史观与研究方法等发表了各自的意见,并就20世纪中国学术在中西文化与学术的碰撞和融合的背景之下的现代品性与总体特点,以及存在的问题与教训、部分具体学科在20世纪的发展脉络等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晋荣东《“20世纪的中国学术”讨论会综述》,《学术月刊》1997年第6期)。1998年在上海召开的“重写学术史”研讨会,与会学者重点围绕近年来出版的学术史著质量、现今条件下重写学术史的必要与可能、重写中遇到的问题与难点、学术史著各种写法的得失等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与深入的研讨。当然,“重写学术史”的关键是能

否建构新的学术史观,其中包括两大核心内容:一是对学术与学术史的重新认知;二是新型学术范式的建立。这在世纪之交的“重写学术史”讨论中也得到了热烈的回应。前者主要围绕“学术史是什么”的问题而展开。陈平原先生主张一种相对开放的泛学术史观,认可中国古代“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传统,更多强调学术史与思想史、文化史的关联(《“学术史丛书”总序》)。李学勤先生则提出把文科和理科、科学与人文放在一起,统一考察的大学术史观,认为“现在通常把自然科学称作‘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叫做‘学术’,其实不妥,因为人类的知识本来是一个整体,文理尽管不同,仍有很多交叉贯通之处。尤其是在学术史上,不少人物对科学、人文都有贡献,他们的思想受到两方面的影响;还有一些团体,其活动兼及文理,成员也包括双方的学者。如果生加割裂,就难以窥见种种思潮和动向的全体面貌。”(《研究二十世纪学术文化的一些意见》,《中国文化研究》2000年第1期)

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学者着眼于学术史之所以为学术史的学术定位提出自己的思考。1997年在上海召开的“20世纪的中国学术”研讨会上,有学者认为必须明确将其与文化史、思想史以及哲学史等区分开来,把“学术”定位在知识形态上,即学术史主要是客观地研究知识的分类、构成、积累等问题,对知识的结构演变、体系的发展脉络予以发生学意义上的追寻,作出分析、说明、描述、勾勒,以此与文化史、思想史作出分殊,给学术史留出独立的位置,树立自觉的意识与确定的立场(晋荣东《“20世纪的中国学术”讨论会综述》,前揭)。2004年,张立文先生在《中国学术的界说、演替和创新——兼论中国学术史与思想史、哲学史的分殊》一文(《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中,对“学术史是什么”作了如下辨思与界定:

学术在传统意义上是指学说和方法,在现代意义上一般是指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诸多知识系统和方法系统,以及自然科学领域中的科学学说和方法论。中国学术史面对的不是人对宇宙、社会、人生之道的体贴和名字体系或人对宇宙、社会、人生的事件、生活、行为所思所想的解释体系,而是直面已有的中国哲学家、思想家、学问家、科学家、宗教家、文学家、史学家、经学家等的学说和方法系统,并藉其文本和成果,通过考镜源流、分源别派,历史地呈现其学术延续的血脉和趋势。这便是中国学术史。

这一界定既为学术史确立了相对独立的立场与地位,又贯通了与哲学史、思想史以及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富有启示意义。

关于如何建构新的学术范式的问题,李学勤先生陆续发表了系列论文展开探索,然后结集并题为《重写学术史》出版,书中“内容提要”这样写道:“‘重写学术史’意味着中国各历史阶段学术思想的演变新加解释和总结。这与我过去说的‘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和‘走出疑古时代’,其实是相承的。晚清以来的疑古之风,很大程度上是对学术史的怀疑否定,而这种学风本身又是学术史上的现象。只有摆脱疑古的局限,才能对古代文明作出更好的估价。”李学勤先生特别强调20世纪考古发现之于“重写学术史”的重要性,提出要由改写中国文明史、学术史到走出疑古时代,由“二重证据法”到多学科组合。作为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著名考古学家,李学勤先生的以上见解,显然与其考古专业立场密切相关。陈平原先生鉴于近代之前的中国学术史研究多以“人”为中心,以“人”统“学”,近代之后一变为以“学”为中心,以“学”统“人”,于是倡导建构以“问题”为中心的新的学术范式,他在《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一书的《导论》中指出:“集中讨论‘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目的是凸显论者的问题意识。表面上只是接过章、梁的话题往下说,实则颇具自家面目。选择清

末民初三十年间的社会与文化,讨论学术转型期诸面相,揭示已实现或被压抑的各种可能性,为重新出发寻找动力乃至途径。这就决定了本书不同于通史的面面俱到,而是以问题为中心展开论述。”后来,陈平原先生在《“当代学术”如何成“史”》一文中更加鲜明地表达了他的学术史观:“谈论学术史研究,我倾向于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编写各种通史。”(《云梦学刊》2005年第4期)从以“人”为中心,到以“学”为中心,再到以“问题”为中心,显示了中国学术史研究学术范式的重要进展,体现了新的时代内涵与学术价值。当然,“人”、“学”、“问题”三者本是互为体,密不可分的,若能将以“问题”为中心与以“人”、“学”为中心的三种范式相互交融,会更为完善。

在实践探索方面,则以李学勤、张立文先生分别主编的《中国学术史》、《中国学术通史》最为引人注目。两书皆为贯通历代、规模宏大的多卷本中国学术通史研究著作。《中国学术史》凡11卷,依次为《先秦卷》(上、下)、《两汉卷》、《三国两晋南北朝卷》(上、下)、《隋唐五代卷》、《宋元卷》(上、下)、《明代卷》、《清代卷》(上、下),自2001年起由江西教育出版社陆续出版。《中国学术通史》凡6卷,依次为《先秦卷》、《秦汉卷》、《魏晋南北朝卷》、《隋唐卷》、《宋元明卷》、《清代卷》,于2005年由人民出版社整体推出。两书的相继出版,一同填补了中国学术史上长期缺少通史研究巨著的空白,代表了世纪之交“重写学术史”的最新进展。至于断代方面,当推陈平原先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影响最著,作者在《导论》中这样写道:“晚清那代学者之所以热衷于梳理学术史,从开天辟地一直说到眼皮底下,大概是意识到学术嬗变的契机,希望借‘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来获得方向感。同样道理,20世纪末的中国学界,重提‘学术史研究’,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解决自身的困惑。因此,首先进入视野的,必然是与其息息相关的‘20世纪中国学术’。”要之,从离我们最近的20世纪中国学术入手,更具重点突破、带动全局的重要意义,可以为重新审视、重构中国学术史提供新的逻辑基点。

对于世纪之交“重写文学史”在理论反思与实践探索两个层面的意义与启示,可以引录左鹏军先生在《90年代“学术史热”的人文意义》(《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一文的概括:

第一,它是对长久以来中国传统学术尤其是对近现代以来中国学术道路、学术建树的全面总结,是对鸦片战争以来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文化命运、学术走势的冷静反省,它实际上蕴含着在世纪末对新世纪的新学术状况、新学术高峰的企盼与期待。

第二,它透露出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在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走过了曲曲折折的学术道路之后,对自己社会角色、社会地位的重新确认,对自己所从事的学术工作的再次估价,对学术本身的地位、价值,对学术本质的进一步思考和确认,表明一种可贵的学术自觉。

第三,它反映出在整个世界学术走向一体化,中国学术与世界学术的交流日趋频繁的历史背景下,中国人文学者建立起完备系统的学术规范,迅速走上学术规范化、正常化之路的要求,表现出中国学者对中国学术尽快与世界学术潮流全方位接触,确立中国学术在世界学术中的应有地位,与世界学术进展接轨、促进世界学术发展的迫切愿望与文化自信。

第四,它体现出人文科学某些相关学科发展的综合趋势,以避免学科分类过细过专、流于琐碎的局限;在方法论上,要吸收和运用古今中外的一切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现代灵活多样的研究手段,深入开展中国学术的研究,使中国学术史的研究从研究方法、学科划分,到操作规程、科研成果,都达到一个崭新的水平。

第五,近年的学术史研究,对近现代学术史之“另一半”,即过去由于种种非学术原因而有意无意被忽略了的、或在一定的政治背景下不准研究的一大批对中国学术作出巨大贡献

的学者,给予了必要的关注,这表明在世纪末到来的时候,中国学术界开始对本世纪的学术历史进行整体全面的反思,试图写出尽可能贴近学术史原貌的学术史著作。

应该说,这一概括是比较周全而精辟的。

今天,当我们站在21世纪新的学术制高点上,以比较理性的立场与态度来审视世纪之交的“学术史热”时,那么,就不能仅仅停留于客观的历史追述,而应在进程中发现意义,在成绩中找出局限,然后努力寻求新的突破。无可讳言,“学术史热”既然已从学术崇尚衍为一种社会风潮,那么它必然夹杂着许多非学术化的因素,甚至难免出现学术泡沫。相比之下,“重写学术史”的工作显然艰苦得多,更需要沉思,需要积淀,需要创新。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先进的学术史观与扎实的文献基础的双重支撑。以此衡之,世纪之交的“学术史热”显然还存在着诸多局限。学术既由“学”与“术”所组成,学者,学说也,学理也,因此学术史研究不仅离不开思想,相反,更需要深刻思想的导引与熔铸。学术史观,从某种意义上说即是学术思想的体现和升华,平庸的思想不可能产生深刻的学术史观。李泽厚先生尝论20世纪90年代是一个“思想淡出,学术凸显”的时代,扼要点中了中国学界八、九十年代的整体学术转向。

“重写学术史”,实质上是对原有学术史的历史重建,而历史重建的成效,则有赖于历史还原的进展。从历史与逻辑辩证统一的要求衡量,“重写学术史”的历史还原与重建,特别需要在中国学术、中国学术史、中国学术史研究三个具有内在逻辑关联的关键环节上作出新的探索,并取得新的突破。

二、中国“学术”:文字考释与意义探源

学术史,顾名思义,是学术发展演变的历史。因此,对中国学术史的历史还原,首先要对“学术”的语言合成与原生意义及其历史流变进行一番考释与探源工作。

何谓“学术”?《辞源》释之为“学问、道术”;《辞海》释之为“较为专门、有系统的学问”;《汉语大词典》梳理从先秦至清代有关“学术”的不同用法,释为七义:(1)学习治国之术;(2)治国之术;(3)教化;(4)学问、学识;(5)观点、主张、学说;(6)学风;(7)法术、本领。其中(3)(4)(5)(6)(7)皆关乎当今所言“学术”之意义。

从语源学上追溯,“学”与“术”先是分别独立出现,各具不同的语义。然后由分而合,并称为“学术”之名。至近代以来,又逐渐被赋予新的时代意义。略略考察其间的演变历程,有助于更深切、准确地理解“学术”本义及其与现代学术意涵的内在关系。

(一)“学”之释义

许慎《说文解字》曰:“敦,觉悟也。从教、冂。冂,尚矇也。臼声。學,篆文敦省。”许氏以“敦”、“學”为一字,本义为“觉悟”。段玉裁注云:“详古之制字作‘敦’,从教,主于觉人。秦以来去‘攴’作‘學’,主于自觉。”以此上溯并对照于甲骨文和金文,则“學”字已见于甲骨文而金文中则“學”、“敦”并存:



前三字为甲骨文,后二字为金文。甲骨文“學”字或从义,或从爻,与上古占卜的爻数有

关。占卜术数是一门高深学问,需要有师教诲,故由“學”字引申,凡一切“教之觉人”皆为“學”,不一定是专指占卜之事。如:

丙子卜贞:多子其延學疾(治病),不聿(遘)大雨? (《甲骨文合集》3250)

丁酉卜今旦万其學? /于来丁廼學? (《小屯南地甲骨》662)

然后从学习行为引申为学习场所,意指学校。如:“于大學拜?”(《小屯》60)大学,应为学官名,即是原始的太学,《礼制·王制》曰:“小学在公官南之右,太学在郊。”

以甲骨文为基础,金文又增加了意为小孩的形符“子”,意指蒙童学习之义更加显豁。儿童学习须人教育,因此本表学习义的“學”兼具并引申为教学之义,故金文再增加“攴”符,成为繁形的“敦”字,由此學、敦分指学、教二义。检金文中“學”字,仍承甲骨文之义,意指学习或学校。如:

小子令學。(令鼎)

小子眾服眾小臣眾尸仆學射。(静簋)

余隹(惟)即朕小學,女(汝)勿剋余乃辟一人。(孟鼎)

王命静嗣射學官。(静簋)

前二例意指学习行为,后二例意指学习场所。

然“敦”之不同于“學”,明显意指“教”之义。如:

克又井敦懿父迺□子。(沈子它簋盖)

昔者,吴人并越,越人修敦備慝(信),五年覆吴。(中山王鼎)

《静殷》:“静敦无。”郭沫若《西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敦当读为教……,无即无敦。”这个“敦”字还保留“觉人”、“自觉”的双向语义,即是说“觉人”为“教”,“自觉”为“学”,不必破通假字。传世文献则已分化为二字二义。如《尚书·兑命》曰:“惟敦學半,今始终典于學,厥德修罔觉。”孔安国《传》云:“敦,教也。”《礼记·学记》由此引出“教学相长”之说。曰:“學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兑命》曰:‘敦學半’,其此之谓乎?”段玉裁尽管曾从词义加以辨析,说:“按《兑命》上敦之谓教,言教人乃益己之半,教人谓之學者。學所以自觉,下之效也;教人所以觉人,上之施也。故古统谓之學也。”其“古统谓之学”,说明“学”是双向的表意,在语源上是没有区别的。

“敦”为教义,征之于先秦文献,也不乏其例:

《礼记·文王世子》:“凡敦世子及學士,必时。”陆德明释文:“敦,户孝反,教也。”

《国语·晋语九》:“顺德以敦子,择言以教子,择师保以相子。”韦昭注:“敦,教也。”

《墨子·鲁问》:“鲁人有因子墨子而學其子者。”于省吾《双剑謄诸子新证·墨子三》:“學,应读作敦。”

要之,由学习至学校,由教学至学习,“学”字在上古包含“觉人”(教)与“自觉”(学)的双向语义。

春秋战国时代,在百家争鸣、学术繁荣的特定背景下,“学”之词日益盛行于世,仅《论语》

一书出现“学”者,凡46处之多。而且,还出现了如《礼记》之《大学》、《学记》,《荀子》之《劝学》,《韩非子》之《显学》等论学专篇。“学”之通行意义仍指学习行为,然后向以下诸方面引申:

1. 由学习行为,引申为学习场所——学校

《礼记·学记》曰:“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遂)有序,国有学。”《礼记·大学》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此“国之学”、“大学”即指最高学府——太学。

2. 由学习行为引申为学习主体——学士、学人、学者

《荀子·修身》曰:“故学曰:迟,彼止而待我,我行而就之,则亦或迟、或速、或先、或后,胡为乎其不可以同至也。”此“学”意指学习者,或衍为“学士”、“学人”、“学者”。《周礼·春官·乐师》曰:“及徹,帅学士而歌徹。”《左传·昭公九年》曰:“辰在子卯,谓之疾日,君徹宴乐,学人舍业,为疾故也。”《论语·宪问》曰:“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礼记·学记》曰:“学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此“学士”、“学人”、“学者”皆指求学者。

由求学者进一步引申,又可指称有学问之人。《庄子·刻意》曰:“语仁义忠信,恭俭推让,为修己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诲之人,游居学者之所好也。”成玄英疏:“斯乃子夏之在西河,宣尼之居洙泗,或游行而议论,或安居而讲说,盖是学人之所好。”而《庄子·盗跖》曰:“摇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学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傲倖于封侯富贵者也。”此“学士”则泛指一般学者、文人。

3. 由学习行为引申为学习成果——学问、学识

《论语·为政》曰:“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论语·述而》曰:“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子罕》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墨子·修身》曰:“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此中“学”字,皆为学问、学识、知识之义,后又进而衍为“学问”之词。按“学问”,本指学习与询问知识、技能等。例如《易·乾》曰:“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辩之。”《礼记·中庸》曰:“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而合“学”与“问”于“学问”一词,即逐步由动词向名词转化。《孟子·滕文公上》曰:“吾他日未尝学问,好驰马试剑。”仍用为动词。《荀子·劝学》曰:“不闻先生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则转化为名词,意指知识、学识。《荀子·大略》曰:“诗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谓学问也。”两者兼而有之。

4. 由学习行为引申为学术主张与学术流派——学说、学派

《庄子·天下篇》曾提出“百家之学”、“后世之学”的概念,曰:“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此“百家之学”、“后世之学”,主要是指学说。而《韩非子·显学》也同样具有《庄子·天下篇》的学术批评性质,其谓“世之显学,儒墨也”。此“学”则意指学派。

由先秦“学”之意涵演变历程观之,当“学”从学习的基本语义,逐步引申为学校、学者乃至学问、学识、学说、学派时,即已意指甚至包含了“学术”的整体意义。

(二) “术”之释义

术,古作術。许慎《说文解字》曰:“術,邑中道也。从行,术声。”段玉裁注:“邑,国也。”術字本义是“道路”,这个字比较晚起,最早见睡虎地秦墓行简,写作:

術

《法律答问》曰:“有贼杀伤人(于)冲術。”银雀山汉墓行简《孙臆兵法·擒庞涓》曰:“齐城、高唐当術而大败。”冲術,即大道、大街;当術,在路上。

然術字虽是晚出,而表示“道路”的意义则存之于先秦文献。如《墨子·号令》曰:“環守官之術衢,置屯道,各垣其两旁,高丈为埤倪。”術衢,指道路,衢也是道路。《庄子·大宗师》曰:“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道術,即道路。词义早就存在了,而表示该词义的字却迟迟未出,滞于其后。这在汉语中是常见的现象。

与“術”关系十分密切的还有一个“述”字,见于西周金文。《说文》曰:“述,循也。从辵,术声。”段玉裁注:“述,或段术为之。”其实,術为“述”字的分化。述为循行,由动词演变为名词,则为行走的“道路”,于是才造出一个“術”字。至少可以说,術、述同属一个语源。

“術”(术)又由道路引申为方法、手段、技能、技艺、谋略、权术、学问、学术等义,则与其道之本义逐渐分离。兹引先秦典籍文献,分述于下:

1. 由道路引申为方法、手段

《礼记·祭统》曰:“惠术也,可以观政矣。”郑玄注:“术犹法也。”《孟子·告子下》曰:“教亦多术矣,予不屑之教诲也者,是亦教诲之而已矣。”此“术”指教育方法。

2. 由方法引申为技能、技艺

《礼记·乡饮酒义》曰:“古之学术道者,将以得身也,是故圣人务焉。”郑玄注:“术,犹艺也。”《孟子·公孙丑上》曰:“矢人惟恐不伤人,函人惟恐伤人,巫匠亦然,故术不可不慎也。”又《孟子·尽心上》曰:“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疢疾。”赵岐注:“人所以有德行智慧道术才智者,以其在于有疢疾之人;疢疾之人,又力学,故能成德。”此“术”与德、慧、知(智)并行,赵岐释之为“道术”,实乃指一种技能、技艺。

古代与“术”构为复合词者,如法术、方术、数术(或称术数)等,多指具有某种神秘性、专门性的技能或技艺。《韩非子·人主》曰:“且法术之士,与当途之臣,不相容也。”此法术犹同方术。《荀子·尧问》曰:“德若尧禹,世少知之,方术不用,为人所疑。”《吕氏春秋·赞能》曰:“说义以听,方术信行,能令人主上至于王,下至于霸,我不若子也。”后方术泛指天文、医学、神仙术、房中术、占卜、相术、遁甲、堪舆、谶纬等。《后汉书》首设《方术传》。术数,多指以种种方术,观察自然界可注意的现象,来推测人的气数与命运,也称“数术”。《汉书·艺文志》谓:“数术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职也。”其下列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六种,大体与方术相近。

3. 由方法引申为谋略、权术

《吕氏春秋·先己》曰:“当今之世,巧谋并行,诈术递用。”此“术”意指一种权谋。先秦

典籍文献中“术”常与“数”连称“术数”，特指谋略、权术，与上文所指技能、技艺之“术数”同中有异。《管子·形势》曰：“人主务学术数，务行正理，则变化日进，至于大功。”《韩非子·奸劫弑臣》曰：“夫奸臣得乘信幸之势以毁誉进退群臣者，人主所有术数以御之也。”《鹖冠子·天则》曰：“临利而后可以见信，临财而后可以见仁，临难而后可以见勇，临事而后可以见术数之士。”皆指治国用人的谋略、权术。

4. 由技能、技艺引申为学问、学术

以《庄子·天下篇》所言“道术”、“方术”最具代表性。《天下篇》曰：

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曰：“无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不离于宗，谓之天人；不离于精，谓之神人；不离于真，谓之至人。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谓之圣人；以仁为恩，以义为理，以礼为行，以乐为和，熏然慈仁，谓之君子；以法为分，以名为表，以参为验，以稽为决，其数一二三四五是也，百官以此相齿；以事相常，以衣食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为意，皆有以养，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

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

“道术”与“方术”一样，在先秦典籍文献中本有多种含义。前引《庄子·大宗师》曰：“鱼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术。”此“道”与“术”同指道路。《吕氏春秋·任数》曰：“桓公得管子，事犹大易，又况於得道术乎？”此“道术”意指治国之术。《墨子·非命下》曰：“今贤良之人，尊贤而好功道术，故上得其王公大人之赏，下得其万民之誉。”此“道”与“术”分别意指道德、学问。而《庄子·天下篇》所言“道术”与“方术”皆意指学术。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释“道术”：“指洞悉宇宙人生本原的学问”，释“方术”：“指特定的学问，为道术的一部分”。“道术”合成为一词，意指一种统而未分、天然合一的学问，一种整体的学问，普遍的学问，接近于道之本体的学问，也是一种合乎于道的最高的学术。而“方术”作为与“道术”相对应的特定概念，也与上引意指某种特定技能、技艺之“方术”、“术数”不同，《庄子今注今译》引“林希逸说：‘方术，学术也。’蒋锡昌说：‘方术者，乃庄子指曲士一察之道而言，如墨翟、宋钘、惠施、公孙龙等所治之道是也。’”则此“方术”意指百家兴起之后分裂“道术”、“以自为方”的特定学说或技艺，是一种由统一走向分化、普遍走向特殊、整体走向局部的学问，一种离异了形而上之“道”趋于形而下之“术”的学问。

要之，“道术”之与“方术”相通者，皆意指学术，所不同者，只是彼此在学术阶段、层次、境界上的差异。鉴于《天下篇》具有首开学术史批评的性质与意义，则以文中“道术”与“方术”之分、之变及其与百家之学、后世之学的对应合观之，显然已超越于“学术”之“术”而具有包含学术之“术”与“学”的整体意义。这标志着春秋战国时代以“百家争鸣”繁荣为基础的“学术”意识的独立、“学术”意涵的明晰，以及学术史批评的自觉。

(三) “学术”之释义

尽管先秦典籍文献中的“学”与“术”在相互包容对应中已具有“学术”的整体性意义,但“学”与“术”组合为并列结构的“学术”一词,却经历了相当长的演变过程,概而言之,大致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

1. 先秦两汉时期“术学”先行于“学术”

略检先秦典籍文献,早期以“学术”连称者见于《韩非子》等。《韩非子·奸劫弑臣第十四》曰:“世之学术者说人主,不曰‘乘威严之势以困奸邪之臣’,而皆曰‘仁义惠爱而已矣’。”但此“学术”皆为动宾结构而非并列结构,与当今所称“学术”之义不同。

两汉时期,学术作为并列结构且与当今“学术”之义相当者,仍不多见。《后汉书》卷五八《盖勋传》曰:“(宋)臧患多寇叛,谓(盖)勋曰:‘凉州寡于学术,故屡致反暴。今欲多写《孝经》,令家家习之,庶或使人知义。’勋谏曰:‘昔太公封齐,崔杼杀君;伯禽侯鲁,庆父篡位。此二国岂乏学者?今不急静难之术,遽为非常之事,既足结怨一州,又当取笑朝廷,勋不知其可也。’臧不从,遂奏行之。果被诏书诘责,坐以虚慢征。”此“学术”大体已与当今“学术”之义相近,但尚偏重于教化之意。

再看“术学”一词,《墨子·非儒下》已将“道术学业”连称,其曰:“夫一道术学业仁义也,皆大以治人,小以任官,远施周偏,近以修身,不义不处,非理不行,务兴天下之利,曲直周旋,利则止,此君子之道也。以所闻孔丘之行,则本与此相反谬也!”道术学业并列,含有“学术”之意,但仅并列而已,而非“术学”连称。

秦汉以降,“术学”一词合成为并列结构者行世渐多。例如:

《史记》卷九十六《张丞相列传》:“太史公曰:‘张苍文学律历,为汉名相,而绌贾生、公孙臣等言正朔服色事而不遵,明用秦之颛顼历,何哉?周昌,木强人也。任教以旧德用。申屠嘉可谓刚毅守节矣,然无术学,殆与萧、曹、陈平异矣。’”

《汉书》卷四十五《蒯伍江息夫传》:“伍被,楚人也。或言其先伍子胥后也。被以材能称,为淮南中郎。是时淮南王刘安好术学,折节下士,招致英隽以百数,被为冠首。”

《后汉书》卷四十上《班彪列传》:“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然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诚令迁依《五经》之法言,同圣人之是非,意亦庶几矣。”

《后汉书》卷五十九《张衡列传》:“安帝雅闻衡善术学,公车特征拜郎中,再迁为太史令。遂乃研核阴阳,妙尽璇机之正,作浑天仪,著《灵宪》、《算罔论》,言甚详明。”

以上“术学”皆为并列结构,其义与今之“学术”一词相当。

2. 魏晋至唐宋时期“术学”与“学术”同时并行

“学术”之与“术学”同时并行,可以证之于魏晋至唐宋时期的相关史书,试举数例:

《晋书》卷六十四《武十三王传》:“晞无学术而有武干,为桓温所忌。”卷七十二《郭璞传》:“臣术

学庸近,不练内事,卦理所及,敢不尽言。”

《梁书》卷二十二《太祖五王传》:“(秀)精意术学,搜集经记,招学士平原刘孝标,使撰《类苑》,书未及毕,而已行于世。”又卷三十八《贺琛传》:“琛始出郡,高祖闻其学术,召见文德殿,与语悦之,谓仆射徐勉曰:‘琛殊有世业’。”

《旧唐书》卷四十三《职官志二》:“集贤学士之职,掌刊辑古今之经籍,以辨明邦国之大典。凡天下图书之遗逸,贤才之隐滞,则承旨而征求焉。其有筹策之可施于时,著述之可行于代者,较其才艺而考其学术,而申表之。凡承旨撰集文章,校理经籍,月终则进课于内,岁终则考最于外。”又卷一百二十六《卢鹗传》:“(鹗)无术学,善事权要,为政苛躁。”

《新唐书》卷一百四十《裴冕传》:“冕少学术,然明锐,果于事,众号称职,(王)鉉雅任之。”又卷一百一《萧嵩传》:“时崔琳、正丘、齐澣皆有名,以嵩少术学,不以辈行许也,独姚崇称其远到。历宋州刺史,迁尚书左丞。”

以上皆为同一史书中“学术”、“术学”同时并行之例。但观其发展趋势,是“学术”盛而“术学”衰。

3. 宋元以降“学术”逐步替代“术学”而独行于世

唐宋之际,“术学”隐而“学术”显,实已预示这一变化趋势。从《宋史》到《金史》、《元史》、《明史》、《清史稿》,“术学”一词几乎销声匿迹,其义乃合于“学术”一词。而就“学术”本身的内涵而言,则更具包容性与明确性,与今天所称“学术”之义更为接近。例如:

《宋史》卷二十三《钦宗本纪》:“壬寅,追封范仲淹魏国公,赠司马光太师,张商英太保,除元祐党籍学术之禁。”

《宋史》卷三百七十六《陈渊传》:“渊面对,因论程颐、王安石学术同异,上曰:‘杨时之学能宗孔、孟,其《三经义辨》甚当理。’渊曰:‘杨时始宗安石,后得程颢师之,乃悟其非。’上曰:‘以《三经义解》观之,具见安石穿凿。’渊曰:‘穿凿之过尚小,至于道之大原,安石无一不差。推行其学,遂为大害。’上曰:‘差者何谓?’渊曰:‘圣学所传止有《论》、《孟》、《中庸》,《论语》主仁,《中庸》主诚,《孟子》主性,安石皆暗其原。仁道至大,《论语》随问随答,惟樊迟问,始对曰:爱人。爱特仁之一端,而安石遂以爱为仁。其言《中庸》,则谓《中庸》所以接人,高明所以处己。《孟子》七篇,专发明性善,而安石取扬雄善恶混之言,至于无善无恶,又溺于佛,其失性远矣。’”

《元史》卷一百四十《铁木儿塔识传》:铁木儿塔识“天性忠亮,学术正大,伊、洛诸儒之书,深所研究”。

《明史》卷二百八十二《儒林传一》:“原夫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矱秩然。曹端、胡居仁笃践履,谨绳墨,守儒先之正传,无敢改错。学术之分,则自陈献章、王守仁始。宗献章者曰江门之学,孤行独诣,其传不远。宗守仁者曰姚江之学,别立宗旨,显与朱子背驰,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其教大行,其弊滋甚。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要之,有明诸儒,衍伊、洛之绪言,探性命之奥旨,锱铢或爽,遂启岐趋,袭谬承讹,指归弥远。”

《清史稿》卷一百四十五《艺文志一》:“当是时,四库写书至十六万八千册,诏钞四分,分度京师文渊、京西圆明园文源、奉天文溯、热河文津四阁,复简选精要,命武英殿刊版颁行。四十七年,诏再写三分,分贮扬州大观堂之文汇阁、镇江金山寺之文宗阁、杭州圣因寺玉兰堂之文澜阁,令好古之士欲读中秘书者,任其入览。用是海内从风,人文炳蔚,学术昌盛,方驾汉、唐。”

《清史稿》卷一百七《选举志二》:“先是百熙招致海内名流,任大学堂各职。吴汝纶为总教习,赴日本参观学校。适留日学生迭起风潮,诿谣繁兴,党争日甚。二十九年正月,命荣庆会同百熙管理大学堂事宜。二人学术思想,既各不同,用人行政,意见尤多歧异。”

《清史稿》卷四百七十三《康有为传》：“有为天资瑰异，古今学术无所不通，坚于自信，每有创论，常开风气之先。”

《清史稿》卷四百八十六《林纾传》：“纾讲学不分门户，尝谓清代学术之盛，超越今古，义理、考据，合而为一，而精博过之。实于汉学、宋学以外别创清学一派。”

《清史稿》卷四百八十六《辜鸿铭传》：“辜鸿铭，字鸿铭，同安人。幼学于英国，为博士。遍游德、法、意、奥诸邦，通其政艺。年三十始返而求中国学术，穷四子、五经之奥，兼涉群籍。爽然曰：‘道在是矣！’乃译四子书，述《春秋》大义及礼制诸书。西人见之，始叹中国学理之精，争起传译。”

此外，明代学者章懋在其《枫山语录》中有《学术》专文，周琦所著《东溪日谈录》卷六有《学术谈》一文，《清史稿》卷二百六十五《陆陇其传》还有载陆氏所著《学术辨》一书，曰：“其为学专宗朱子，撰《学术辨》。大指谓王守仁以禅而托于儒，高攀龙、顾宪成知辟守仁，而以静坐为主，本原之地不出守仁范围，诋斥之甚力。”从以上所举案例可知，宋元以来取代“术学”而独行于世的“学术”一词，因其更具包容性与明确性而在名实两个方面渐趋定型。

4. 晚清以来“学术”的新旧转型与中西接轨

晚清以来，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随着中国“学术”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学界对“学术”的内涵也进行了新的审视与界定。1901年，严复在所译《原富》按语中这样界定“学术”中“学”与“术”的区别：“盖学与术异，学者考自然之理，立必然之例。术者据既已知之理，求可成之功。学主知，术主行。”10年后，梁启超又作《学与术》一文，其曰：

近世泰西学问大盛，学者始将学与术之分野，厘然画出，各勤厥职以前民用。试语其概要，则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例如以石投水则沉，投以木则浮。观察此事实，以证明水之有浮力，此物理学也；应用此真理以驾驶船舶，则航海术也。研究人体之组织，辨别各器官之机能，此生物学也。应用此真理以治疗疾病，则医术也。学与术之区分及其相互关系，凡百皆准此。善夫生计学大家倭儿格之言，曰：科学（英 Science，德 Wissenschaft）也者，以研索事物原因结果之关系为职志者也。事物之是非良否非所问，彼其所务者，则就一结果以探索所由来，就一原因以推理其所究极而已。术（英 Art，德 Kunst）则反是。或有所欲焉者而欲致之，或有所恶焉者而欲避之，乃研究致之避之之策以何为适当，而利用科学上所发明之原理原则以施之于实际者也。由此言之，学者术之体，术者学之用。二者如辅车相依而不可离，学而不足以应用于术者，无益之学也。术而不以科学上之真理为基础者，欺世误人之术也。（初刊1911年6月26日《国风报》第2册第15期。后载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之二十五下，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

梁启超以西学为参照系的对“学术”的古语新释，集中表现了当时西学东渐、西学中用的时代风气以及梁氏本人欲以西学为参照，推动中国学术从综合走向分科、从古典走向现代并以此重建中国学术的良苦用心。但取自西学的科学、技术与中国传统“学术”仅具某种对应关系而非对等关系，难免有以今释古、以西释中之局限。由此可见，对于中国学术尤其需要西方与本土、传统与现代学术概念的互观与对接，需要从渊源到流变的学术通观。

三、中国学术史：形态辨析与规律探寻

中国学术史源远流长，而对中国学术史的形态辨析与规律探寻始终没有停息。《庄子·

天下篇》之于“道术”与“方术”两种形态与两个阶段的划分,可以视为中国学术史上最先对“古”、“今”学术流变的总结,实乃反映了作者“后世之学者,不幸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的学术史观,以及由今之“方术”还原古之“道术”的学术崇尚,与同时代其他诸子大相径庭。此后,类似的学术史的总结工作代代相续,随时而进,而不断由“今”鉴“古”所揭示的中国学术史发展轨迹与形态,也多呈现为不同的面貌。比如,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所论,凡阴阳、儒、墨、法、名、道六家,而《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则增为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十家,然后归纳为“诸子出于王官”之说,皆与《庄子·天下篇》不同。再如,唐代韩愈《原道》率先提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的“道统”说,继由宋代朱熹《中庸章句》推向两宋当代,完成经典性的归纳:“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颜回—曾参—子思—孟子—二程”,在似乎非常有序的学术史链接中,完成了以儒家为正统的序次定位。但这仅是反映韩愈、朱熹等复兴儒学倡导者的学术史观以及文化史观,不能不以排斥乃至牺牲中国学术史的多元性、丰富性为代价,显然是一种以偏概全的概括。由“道统”而“学统”,清代学者熊赐履进而在直接标示为《学统》之书中,以孔子、颜子(回)、曾子(参)、子思、孟子、周子(敦颐)、二程子(程颐、程颢)、朱子(熹)9人为“正统”,以闵子(騫)以下至罗钦顺23人为“翼统”,由冉伯牛以下至高攀龙178人为“附统”,以荀卿、扬雄、王通、苏轼、陆九渊、陈献章、王守仁等7人为“杂统”,以老、庄、杨、墨、告子及释、道二氏之流为“异统”(参见《四库全书·总目·史部·传记类存目五》《学统》五十六卷提要)。虽然对韩愈、朱熹“道统”的纯粹性作了弥补,但以儒家为正统、以纯儒为正统的观念未有根本的改变。

近代以来,梁启超以西方学术为参照系,由清代上溯中国学术,先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一文中将中国学术史划分为八个时代:“一胚胎时代,春秋以前也;二全盛时代,春秋及战国是也;三儒学统一时代,两汉是也;四老学时代,魏晋是也;五佛学时代,南北朝隋唐是也;六儒佛混合时代,宋元明是也;七衰落时代,近二百五十年是也;八复兴时代,今日是也。”继之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提出“自秦以后,确能成为时代思潮者,则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及明之理学,清之考据学,四者而已”。基于时代与个人的双重原因,梁氏抛弃了长期以来以儒家为正统、以纯儒为正统的“道统”说与“学统”说,力图以融通古今、中西的崭新的学术史观,还原于中国学术原生状态与内在逻辑,这的确是一个重大突破,标志着中国学术史研究已实现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并与世界接轨,具有划时代意义。可以说,此后的中国学术史构架几乎都是以以此为蓝本而不断加以调整和完善,当“先秦诸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近代新学”已成为后来概括中国学术史流变的通行公式时,尤其不能遗忘梁氏的创辟之功。

世纪之交,受惠于“重写学术史”的激励和启示,我们应该以更加广阔的视野、更加多元的维度以及更加深入的思考,对中国学术史的形态辨析与规律探寻作出新的建树,实现新的超越。

中国学术孕育于中国文化之母体,受到多元民族与区域文化的滋养而走向独立与兴盛,并在不同时期呈现为不同的主流形态与演变轨迹。而中国学术之所以生生不息,与时俱进,也就在于其同时兼具自我更新与吸纳异质学术文化资源的双重能力,在纵横交汇、融合中吐故纳新,衰而复盛。因此,从“文化—学术”、“传统—现代”、“本土—世界”这样三个维度,重新审视中国学术史的历史进程与演变规律,则大致可以重新划分为华夏之融合、东方之融合与世界之融合三个历史时段,这三个历史时段中的中国学术主导形态及其与世界